

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

(supported by program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tart-up funds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项目名称：二程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R20012）

易学视野下的 二程理学建构

李永富◎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 / 李永富著.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1
ISBN 978-7-5643-7726-7

. 易... . 李... . 程颢 (1032-1085) -
哲学思想 - 研究 程颐 (1033-1107) - 哲学思想 - 研究
. B24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95212 号

Yixue Shiye xia de Ercheng Lixue Jianguou

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

李永富 著

责任编辑 郑丽娟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6.5

字 数 242 千

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7726-7

定 价 8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028-87600562

前言

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建构是与其全新易学观为基础的，是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新内涵，并涵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地的生化日新入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认为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体的性命之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的我。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应天理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完成之时。而程颢、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本书试图厘清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阐明他们的易学分别在其理学体系建构中所起的统摄作用和基础作用。

本书由六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首先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进而阐述了探讨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的意义和研究思路，并交代了本书的研究方法。现当代学者已经从理学、易学、礼学等多个视角，对二程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在程颢易

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程颐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因此，本书拟从宇宙图景、性理之学、工夫进路以及境界追求四个方面，阐发程颢和程颐的易学对于其各自理学建构的作用，厘清他们思想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说明二程人格气象的异同正是由其思想的异同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传世的程颢和程颐的文献资料加以梳理，并将其作为研究文本。其次，基于易学天人之际的特点，阐明程颢和程颐通过阐扬《易》中已有的本体思想、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等内容，加上涵摄融会此前的典籍和前人研究成果，实现自身理学体系建构的过程。最后，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置身于二程理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还原他们建构理学体系的原貌，并阐明研究程颢和程颐理学体系的建构，既有利于促进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又有助于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第一章，易学语境下二程全新总体宇宙图景的开显。这一章试图还原二程以其易学来建立宇宙图景的过程，并阐明他们对天理诠释的异同之处。本章首先阐述了程颢和程颐之前儒家宇宙本然研究范式的转换。《易》描绘了生化日新、异彩纷呈的天人万象之道，汉唐经学将其理解为天人同构、一体贯通的生活世界。但是，儒家并未建构起自身的本体论。程颢和程颐对汉唐经学注重经义训诂的解经模式提出了批评，并对玄学本体论加以转化，将天理确定为万物背后的形而上根基和价值依据。尽管二人都以天理为终极的根基根据，可是他们对天理的理解却同中有异。程颢从生生之理中体贴出了天理，并将仁与天理通而为一，描绘了一幅生化日新、天人本一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在这一宇宙图景中，天地创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主客之分被超越，天地人物之间呈现一体互通、内在互连的态势。程颐从天道生化日新的原因入手，强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天理是万物背后的本体

依据，进而勾勒出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主客之分被凸显，天地人物之间呈现异彩纷呈、天人合一的情形。

第二章，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与理学心性论的确立。本章阐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阐扬，并说明他们正是以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为基础来建构其理学心性论的。周敦颐将研究《易》的重点由阴阳之理转换为性命之理，程颢和程颐光大了《易》中的性命之理，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理学的心性论。他们借鉴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分的解释范式，将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程颢认为，人人皆有完善自足的、绝对善的本然之性；这一本性来源于天理。在程颢看来，天地间并不存在纯粹的本然之性，只有具体的人物之性。而具体的人物之性，又是天理与气结合后的产物。程颢用《易》中的“各正性命”来说明天理的实现过程，认为天理流注到个体身上就体现为不同的性命。具体的人物之性已经是“生之谓性”，不再是本然之性。由于本然之性和“生之谓性”都是性，故他不对性、心、情做严格区分。与程颢不同，程颐认为，只有本然之性才是性，“生之谓性”是气稟的产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程颐强调心分体用，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程颐认为，性为未发，是至善的；情为已发，有善有恶。程颐还使用体用范畴，对仁与爱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第三章，易学工夫论新内涵的凸显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本章重建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修养工夫的阐扬，并以此为框架建构自身理学工夫论的过程。在易学的宏大视域中，程颢和程颐汇通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典籍中的工夫思想，提出了自身的理学工夫论。程颢吸收了周敦颐观万物生意的修养方法，提出了以识仁和定性为特色的理学工夫论。程颢重视向内的直觉体验，把格物穷理看成识仁的同义词，又把养气看作定性的手段，还将循理无违当作工夫进路的高级阶段。程颐把周敦颐的“主静”改为“主敬”，还借

鉴了王弼的“性其情”，建构了以持敬和穷理为特色的修养工夫。程颐立足于主客二分，认为格物穷理离不开诚敬，主张通过涵养正气来处理性情关系，要求个体循理而为。

第四章，易学理学二而一视域下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这一章再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发扬，并说明他们在易学理学二而一的视域下建构了自己的境界哲学。《乾卦·文言传》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已有明确的境界意味。他们对《易》中的境界论予以发扬，并通过对前人境界哲学的涵摄吸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境界哲学。程颢把仁者与圣人贯通起来，建构起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在生活中，程颢待人宽和，给人以“如坐春风”之感。这正是程颢所追求的圣人境界的现实化。程颐对仁者和圣人做了区分，树立起天人合一的境界哲学。在待人接物时，程颐给人以庄重严肃的印象，展现出注重道德践履的贤者气象。尽管程颐所展现出来的是贤者气象，可是，他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第五章，二程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及现代价值。本章总结了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理学建构模式及其理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和现代价值。在后世，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易学思想和理学思想都发挥了重大影响，他们也因此得以从祀孔庙。他们建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的文化自觉，也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代，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为民族文化复兴，为建立天人和谐、人我和谐的社会发挥正面作用。

目 录

引言	0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003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得失	007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024
第一章 易学语境下二程全新总体宇宙图景的开显	030
第一节 宇宙本然研究范式的更新	033
第二节 天理本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内涵	043
第三节 程颢建构的生化日新、天人本一的 总体宇宙景象	065
第四节 程颐眼中的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 有机整体世界	073
第二章 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与理学心性论的确立	082
第一节 性理研究范式的转换	083
第二节 程颢对易学性命之理的新阐释及其 理学心性论的建构	092
第三节 程颐易学的性命之理及其理学心性论的确立	102
第三章 易学工夫论新内涵的凸显与理工学工夫论的建构	118
第一节 二程工夫进路的思想渊源	119
第二节 程颢的易学工夫论新内涵及其 理工学工夫论的建构	126
第三节 程颐的易学工夫论新诠释及其 对理学修养工夫的设想	150

第四章	易学理学二而一视域下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	189
	第一节 境界哲学探究的返本开新·····	191
	第二节 程颢建构的圣人与仁者二而一的 圣贤境界与气象·····	202
	第三节 程颐建构的与理为一的圣贤境界与气象·····	215
第五章	二程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及现代价值·····	230
	第一节 二程的历史地位·····	231
	第二节 二程思想的后世影响·····	236
	第三节 二程思想的现代价值·····	240
	主要参考书目·····	248

引言

二程兄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位列“北宋五子”。程颢(1032—1085)，字伯淳，时称明道先生，曾经担任地方官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后人尊称其为“大程子”。程颐(1033—1107)，字正叔，时称伊川先生，曾经担任过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官职，后世尊称其为“小程子”。程颢和程颐早年曾受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和程颐以此为起点，终身勤学善思，终于在易学的框架下，以易学天人之学的全新视域，发掘了先秦儒学的精髓，涵摄了佛道思想的精华，创立了其理学体系。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程颢和程颐复兴儒学、建构理学，又是在继承前人和与同时代学者的学术互动中实现的。诚如陈来先生所云：“理学的正式诞生虽然在北宋中期，但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它所由以发展的一些基本思想方向在中唐的新儒学运动及宋初的思潮演变动向中可以找到直接的渊源。”在历史上，唐代的韩愈、李翱都是公认的理学先驱。

在《原道》中，韩愈“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韩愈的做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李珣平：《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法既促使儒家的传道系统开始由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转变，又是儒家的经典系统从五经向四书转变的开端。与韩愈一样，李翱也对《论语》比较推崇，二人合著《论语笔解》一书。此外，李翱还将《中庸》《易传》和《乐记》相贯通，著成了“上接佛学，下开理学”的《复性书》。

到了宋初，孙复、胡瑗、石介等人继续推进儒学复兴。其中，石介不仅在思想上极力推崇韩愈，而且在为人处世上效法韩愈的风骨；孙复精研《春秋》，批评佛老，宣扬尊王攘夷；胡瑗不仅精通易学，而且积极宣讲《论语》。三人因在儒学复兴上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宋初三先生”。之后，周敦颐积极将《周易》与《中庸》会通，在宋代儒家学者中首开在易学视域下涵摄、阐释四书学的先河。在周敦颐之后，张载在易学的视域下，继续阐释《中庸》《孟子》的精深意蕴。与周敦颐和张载类似，程颢和程颐在易学天人之学的宏大视域下，不仅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使其独立成篇，而且极力凸显《大学》《中庸》的价值，还将曾子、孟子纳入儒家的传道系统。在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程颢和程颐不仅对前人的思想资源有所继承，也与张载、邵雍等同时代学者进行了思想互动。最终，在朱熹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儒家的“道统论”得以最终形成。与此同时，儒家的经典系统从五经到四书的过渡，也彻底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渡过程中，易学始终是两宋理学家阐发儒门固有真意的理论指导和思维架构。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程颢和程颐之所以要建立自身的理学体系，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官员数量膨胀、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军队数量多等问题。在他们看来，理学不只要解决佛道二教甚嚣尘上、儒门淡漠的现实，使儒学重回思想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且要通过“格君心之非”、辨明理欲、区分公私等手段，实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于是，“在张大道统意识、彻底恢复作为华夏文化本统、正脉之所在的儒学之正

石峻：《石峻文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71-372页。

统地位这一理念的激励下”^①，程颢和程颐接续了华夏文化之正统，成为理学的奠基人。这一理学体系最终由朱熹发扬光大，并在南宋之后逐步成为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官方意识形态。二程也因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而得以入祀孔庙。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赵宋承五代乱世而来，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知识普及等方面，都有空前的建树，也被海外学者赞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朝代。在国内，今人吴钩也将宋代视作“现代的拂晓时辰”。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的社会治理不仅得到了今人的称赞，也受到了当时儒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在宋儒看来，宋代的治理，不仅以“回向三代”为政治追求，而且是把二程理学作为根基的。宋人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宗师也。”^②在此处，黄震所说的程先生就是程颢和程颐。可以说，如果没有二程理学，宋代的社会治理就会出现大问题。因此，卢国龙说：“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③尽管二程洛学实质上是政治哲学，可是，它的产生却是借助易学研究而完成的。

一、易学是二程理学体系建构的理论视域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建构是与其全新易学观为

王新春：《牟宗三先生新儒家视野下的孔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宋〕黄震：《黄氏日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546页。

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

基础的，是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新内涵，并涵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地的生化日新入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认为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体的性命之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的我。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应天理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完成之时。而程颢、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

二程在易学的框架下，建构起自身的理学体系，实乃宋代学者通行的研究范式。在当时，理学家往往也是易学家，而理学家的体系建构也与其易学研究紧密关联。在易学的架构下，理学家通过对四书的解释，使“儒家不但重又获得了自身价值体系的根源性意义，而且找到了抵御和批判佛教出世主义的强有力武器”。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二程建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直面佛道冲击的文化自觉。随着二程弟子将洛学传播到各地，程颢和程颐的研易释易、易学研究与理学体系建构齐头并进的研究范式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最终成为后儒研习易学和建构理学体系的范式。因此，要研究程颢和程颐的理学体系建构，就要从易学视野着手。

二、研究意义

景海峰：《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载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首先,研究二程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厘清二程易学与其理学的关系。

程颢和程颐首先是易学家,并借助其易学研究,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才成为理学家。可以说,二程易学研究完成之时,就是其理学体系建构成功之日。这一研究范式上承周敦颐,下启二程后学。

虽然程颢没有大部头的易学著作,可是,我们能够从《遗书》中他的语录上发现其研易、释易的证据。从程颢的语录中,我们可以发现,程颢也是易学大家,他的易学也有其鲜明特色。程颢由解读“生生之谓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入手,阐释了易学中的总体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与此同时,程颢易学又与其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阐发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同时,其理学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在今天,研究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之间的关系,说明其如何在易学天人之学的视域下,创造性地转化前人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儒学的创新性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看程颐,他不但研习《易》,还在晚年著成了彪炳后世的易学巨著——《周易程氏传》。胡自逢说:“综伊川一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此皆伊川潜心《易》道之功,充积力久,不自知其与《易》而为一也。”程颐不仅终其一生都在潜心研究易学,而且重视以学问滋养自己的生命,最终在晚年达致“与理为一”的人格境界。通过学易、释易、践易,程颐既阐发了易学中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性命之理、工夫论与理想人格,又实现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这一理学体系建构的研究范式承前启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其次,探讨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深化理学史、易学史研究。

二程研易、解易,并将易学研究与其理学体系建构同时进行的易学解释范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伯崑先生认为,“程氏《易》学继王弼之后,将义理学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易》学史上有

胡自逢:《程伊川易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其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程颐的《易》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宋代开始，理学家大都是通过易学研究来建构其理学体系的。到了南宋，朱熹也是“通过对《周易》经传解释，阐发了理学派的哲学体系，成为以后几个世纪官方哲学的代表”。在其后，湛若水、罗钦顺在建构自身的理学体系时，也受到了二程的易学思想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可见，二程的易学解释暨理学建构范式的确在后世发挥了典范意义。

在今天，要研究宋代之后的理学史和易学史，二程都是绕不开的人物。因此，二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可以让我们了解宋代及以后理学发展的思想脉络。研究二程的易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及以后易学传承的内在逻辑。一旦拥有对理学与易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逻辑的切实体会，我们就能深化对理学史、易学史和哲学史的理解。

最后，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在宋代，面对佛道二教的冲击，程颢和程颐在易学的架构下，发掘了先秦儒学的精髓，涵摄了佛道二教的合理因素，建构起了自身的理学体系，从而阶段性地完成了儒学复兴的历史使命。二程直面佛道冲击，重振儒学，展现了他们的文化主体性和使命感。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即所谓文化主体性和使命感，也即费孝通所讲的“文化自觉”。

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二程去世后，经过胡安国、朱熹等人的传扬，洛学逐步成为正统思想。到了元、明、清三代，理学既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又在维护社会秩序、传承儒家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到了当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有机组成部分，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467页。

也值得我们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解释。

要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不仅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积极开展跨文化交流，还得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冲突和问题。第一，在跨文化交流时，我们要坚持文化主体性。易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在涵摄、吸收其他文化之中的合理成分上，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和足够的理论定力。第二，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需要借鉴二程的研究范式。程颢和程颐易学与理学合二为一的诠释风格，可以使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解释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立足易学视野，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厘清其理学与易学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宋明理学史、宋明易学史的研究，还能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探索道路。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得失

在易学的视域下，程颢和程颐通过研究易学，建构起了自身的理学体系。笔者认为，要从易学视野入手，研究二程的理学建构，就要对二程的理学思想、易学思想、理学体系建构和元典文献鉴别等问题，进行文献梳理。现当代学者已经从理学、易学、礼学等多个视角，对二程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笔者将就目力所及之文献，择其要者略做陈述。

一、理学研究

程颢和程颐的理学体系包括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等内

容。在程颢和程颐的理学研究方面，现当代学人已经取得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

（一）天理论

学界对程颢和程颐的天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现当代学者对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的探讨，与其对二程的天理论的研究密不可分。冯友兰先生从人格气象的异同出发，认定程颢和程颐的思想确有不同。冯先生反对把程颢和程颐称为二程，指出“其实二程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哲学思想，而程颢的哲学思想，则为‘陆王’所继承、发展”。冯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的天理论上。程颢所谓的“天理”指的是事物之中的自然趋势，程颐所谓的“天理”实质上是从万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上，程颢和程颐的界定也有不同：程颢不对形而上形而下做区分，也不重视理气的分别；程颐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描绘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即既有明显区别，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不同，钱穆先生认为，尽管程颢和程颐在人格气象上确有差异，在思想上却是大体相同的。钱穆先生认为，程颢所谓“天理”是由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入手体验出来的。天理，并不是宇宙之理，而是人生之理。张岱年先生认为，虽然程颢和程颐都以天理为本根，却对天理给予了不同的解读：“程明道所谓理乃指生生之理，以生或易为宇宙之根本原理。程伊川所谓理，则指气之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对天理的理解上的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121页。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64-79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1页。

同，是他们的思想各具特点的根源。侯外庐先生认为，二程的思想没有差异，主张天理独立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本源和本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侯先生把天理看成了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余敦康先生认为，二程在本体论上完全一致，在工夫层面略有差异。他认为，程颢和程颐“都是在致力于把天理确立为最高的哲学范畴，阐发其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勉强要找出有什么不同，只能指出某些属于‘工夫’层面上的差异，在‘本体’层面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与余敦康先生类似，向世陵先生也认为，尽管二程兄弟在治学教人的风格上有很大差异，可是兄弟二人在根本思想上是一致的。向世陵先生说：“二程之间，对于形而上下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并没有原则性的不同。”

还有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的天理论思想。成中英先生研究了二程本体哲学的思想渊源和架构，认为“一方面，程颢是根据《大学》、《中庸》的传统，并以这两个文本为契机来创发其对于现实的直接思考。就此而论，他比他的先行者达到了更加独立的哲学思考；但另一方面，他也遭遇到困境，即是如何把他的思想和观念表述成一个逻辑的形上系统。这个系统化的工作要到他的弟弟程颐那里才得以创建，而其完成则要到朱熹——程颐的四传弟子那里才实现”。在《仁学本体论》一书中，陈来先生研究了程颢的“仁体”，认为“实体的仁体既是人识得的实在对象，也可以成为个人拥有的东西，实体是可以贯通到人的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6-76页。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155页。

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

向世陵：《理气心性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美]成中英著，杨柱才译：《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身心的实在”。胡自逢先生阐述了程颐以天理为根基的天人之学，说：“《程传》会天人之理而归之于人事，既不昧其本原，而又人可施行，使《易》之大用，益以恢廓，伊川之力也。”朱汉民先生探讨了二程天理论思想的文化意义，认为“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冯达文先生研究了程颢和程颐在天理论方面的异同，认为“大程一方面既以‘理’为一种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主张以‘知’去把握却强调以‘心’去体证此‘理’而显得不圆熟，那么在‘理’本论的范围内，小程却表现了理论的一贯性”。徐洪兴先生研究了二程的“仁”与“礼乐”思想，认为“作为天地之序的‘礼’和天地之和的‘乐’，就是‘天理’的实质性的内涵，它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价值的本体”。李晓春先生从天理与善恶的关系入手，研究了程颢与程颐在天理论上的思想异同，认为“程颢的理刚从气主理从的形态中脱胎出来，故而此理正像气主理从那样，紧紧地结合在气中，只不过在程颢这里，主要的视角是观看理而不是气。程颐的理则在其兄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超越于气而呈现一独立自存的趋势”。杨仁忠先生研究了二程天理论与佛学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的天理论深深地源于佛学的‘法身’说、‘理事’范畴论、一多论证论等多个方面”。在笔者看来，即使天理与法身等范畴在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70页。

胡自逢：《程伊川易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朱汉民：《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徐洪兴：《二程论“仁”和“礼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李晓春：《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杨仁忠：《二程天理论的佛学渊源及其文化学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也无法掩盖儒、佛在形上依据和价值关怀层面的天壤之别。

（二）心性论

在心性论方面，学界已经获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将二程合起来讲，进行了一些研究。侯外庐先生认为，二程将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代表人之本性；而“‘气质之性’也叫做‘才’，它由气禀所决定，禀清气则为善，禀浊气便为恶”。张立文先生探讨了二程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二程采纳了张载‘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念，认为‘性’有‘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别，两者的来源、标准以及能否改变等都不一样”。向世陵先生认为，二程人性论的特点“在于将‘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联系起来，构成为性本无善恶与气禀有善恶相结合的理论模型，而本体之性与现象气禀的二分则是问题的核心”。朱康有先生研究了二程理学与心性实学的关系，认为“二程的思想中就蕴涵着心性实学的萌芽”。魏义霞女士探究了二程的命运观，认为“二程接续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传统，在天命论所宣扬的人命天定的前提下，探讨人之性命”。刘固盛先生研究了二程人性论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人性论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建构，并非原始儒学的自然延伸，而是受到了当时的道教学者陈景元、张伯端老学思想的影响”。笔者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向世陵：《“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朱康有：《二程理学：心性实学之萌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魏义霞：《中国人的命运哲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

刘固盛：《二程人性论的道家思想渊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认为，虽然二程对佛道思想有所借鉴，却是以其易学思想为架构，来涵摄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的。彭耀光先生研究了二程对孟子性论的诠释，认为“二程对孟子性论的诠释，着力凸显了性的两重维度：一方面，性具有超越性，其与天道、天理为一，是一形上本体；另一方面，性又具有内在性，它必即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事而存在，因而必须在道德行事上去体证性体”。

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习惯于分别论述二程的心性论思想。卢连章先生研究了二程心性论的异同，认为程颢从“生之谓性”的角度来阐述心性论，而“程颐人性论的核心内容是‘性即理’”。在《宋明理学心性论》一书中，蔡方鹿先生研究了二程在心性论上的异同，认为“程颢哲学心性论的特点是讲融通合一，不讲体用之分，这与程颐心兼体用的思想存有差异”。李景林先生比较了二程心性论的异同，认为“二程心性论的基本共同点是，把性理解为在其动态的创造展开活动中的整体性；而这个创造展开活动，即‘心’在其体用统一中的精神活动”。英国学者葛瑞汉先生将二程的哲学分开来讲，认为“对伊川来说，性在万物中都一样，虽然它被气不同程度地遮蔽。对明道来说，每一生灵都有各自的性，因此各有自己的循理方式”。

（三）工夫论

在工夫论方面，前贤和时哲普遍注意到二程的差异。冯友兰先生认

学版》2005年第2期。

彭耀光：《二程的“道学”与道统观——以二程对孟子性论的诠释为中心》，《东岳论丛》2015年第12期。

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96页。

李景林：《二程心性论异同与儒学精神》，《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

[英]葛瑞汉著，程德祥等译：《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

为，虽然程颢和程颐都讲涵养须用敬，然而“明道须先‘识得此理，然后以诚敬存之’。……伊川则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求‘脱然自有贯通处’”。张岱年先生研究了二程工夫论的异同，认为“明道的方法则全从孟子来，主张反求于内”；又认为“伊川之整个的哲学方法，是参用直觉与思辨的”。侯外庐先生从知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了二程的工夫论与佛学的联系，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正是佛学‘渐修’、‘顿悟’的变相的说法，集众理的‘格物’即渐修，脱然而觉悟的贯通即顿悟”。钱穆先生认为，程颐发展了程颢的修养工夫，指出：“大抵颢之教人，侧重在如何修养自己的心；颐对此极多阐述，更添进许多实际的治学方法，教人如何获得知识。”钱穆先生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句为例来说明，认为前半句是程颢的观点，后半句是程颐所添加的治学方法。张立文先生比较了二程在工夫论层面的思想异同，指出：“二程均认为，在‘格物穷理’的过程中，是划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二程之异就在于，当认识主体在‘穷理’而后回归到‘理’的逻辑过程中，程颢强调了‘有我’，程颐则讲‘无己’。”高怀民先生研究了程颢的《定性书》，认为“分内外意即未达其根本，达其根本之一则知无分于人、物，无分于内、外，人、物与内、外无分，故能与万物相应，无物不应，以性相通故”。值得一提的是，高怀民先生还研究了程颐修养工夫与其易学思想的关联，认为“小程子在修养工夫中两个主要的操守——‘诚’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46页。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49页。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3页。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9页。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与‘敬’，数其根源，也密切关联着易学”。

也有些学者分别从其他方面入手，探讨了二程的工夫论。向世陵先生从“不失本心”的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对孟子保持本心思想的发展，认为“孟子并未说明‘欲’到底是如何一种心理状态，程颐则有发挥，认为心只要有向往追求便是物欲，而不必是完全沉溺于其中”。陈来先生比较了程颢和程颐对诚敬的不同观点，认为“程颢以诚与敬并提，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敬的修养必须把握一个限度，不应伤害心境的自在和乐。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谓主敬的主要内容是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虑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在《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蔡方鹿先生研究了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认为“二程既分别论述了格物说与致知说，又阐述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其格物致知论的严整理论内涵”。郭晓东先生从工夫论视域入手，研究了程颢的哲学思想，认为“识仁”也就是“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乃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文碧芳先生研究了程颢的识仁之方，认为“大程仁说乃具备明显的宗教性维度”。温伟耀先生对程颢和程颐的工夫论做了比较研究，认为“明道的工夫论较着重圆顿的观照境界，而伊川则精确而严谨，着重深细的工夫”。邓联合先生从近代知识论的角度研究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论，认为“‘格物致知’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既坚持认为要探求外在自然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向世陵：《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郭晓东：《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8页。

文碧芳：《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3期。

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又没能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认知方法”。方旭东先生研究了程颐和朱熹的“知而不行”思想，认为“在‘知而不行’问题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刘蔚华先生探究了二程的理欲观和弗洛伊德的超我说之间的异同，认为“弗氏和二程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大体一致的原理，就是人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就能够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人的本我状态与超我状态，同样都是现实的”。梅珍生先生研究了二程的“主敬”工夫与其易学思想的关联，认为“《易》中的‘敬以直内’等思想，成为程颐关聚‘敬’字的主要思想资源”。

（四）境界论

在境界论上，学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有些学者认为，二程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是相同的。冯友兰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所说的仁者境界即天地境界。冯先生说：“在仁者的境界中，人与己，内与外，我与万物，不复是相对待底。”冯先生认为，“在天地境界底人的‘真我’，不仅是他自己的主宰，而且又是全宇宙的主宰”。蔡方鹿先生研究了二程的理想人格与价值取向及其后世影响，将追求成圣看作二程人格观的最高理想，认为“二程的价值取向，主要以三代、道德、社会、中、

邓联合、周广立：《程颐、朱熹“格物致知”论思路判析——从近代认识论角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方旭东：《道德实践中的认知、意愿与性格——论程朱对“知而不行”的解释》，《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刘蔚华：《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文史哲》2002年第3期。

梅珍生：《论二程“主敬”工夫的易学思想资源》，《周易研究》2014年第1期。

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5页。

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6页。

内在精神等内容为价值的标准”。

也有些学者认为，二程的境界论思想同中有异。崔大华先生比较了二程境界论的异同，认为“在程颢这里，‘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是以‘识仁’、‘浑然与物同体’来界定、来表述其特征的。……程颐认为，‘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是将个体之己溶化于‘理’中，是‘无己’”。陈来先生将程颢和程颐的同中之异界定为境界取向不同，认为“程颢并不像后来南宋心学的代表陆九渊那样强调心即是理，更不像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他对内向体验的强调主要是基于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与程颐不同”。在《仁学本体论》一书中，陈来先生研究了程颢的仁学思想，认为“仁的这种境界的基本特征是‘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一体’，其意义是要把自己和宇宙万物看成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把宇宙的每一部分都看成和自己有直接的联系，看成自己的一部分”。

还有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的境界哲学。蒙培元先生研究了程颢的境界论，认为程颢“把儒家‘仁’的境界提升为普遍的宇宙关怀，其中既有道德和美学意义，又有宗教精神，他的‘浑然与物同体说’、‘天地万物一体说’，就是这种境界的最好的表述”。付长珍女士研究了二程境界哲学的不同取向，认为“与程颢提倡直觉主义偏重即本体即工夫的体悟不同，程颐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性情理欲的辨析以及心对性的认知，偏重于形而下的细密工夫，突出严格的日常规范践履，呈现出谨严、敬重、刻板的理性主义特征”。洪梅女士研究了程颐寻

蔡方鹿：《二程的理想人格与价值取向及其后世影响》，《天府新论》1994年第3期。

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6页。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62页。

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付长珍：《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孔颜乐处思想的生态意义，认为“‘孔颜乐处’既是孔子一样的圣人‘仁民爱物’之乐，也是颜子一样学做圣人的人在学习与修养过程中的乐”。李韦先生研究了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生态哲学面向，认为“天人无间，天人本无二，那么人与万物都来自这个天地，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物我不可分”。

二、易学研究

在程颢、程颐的易学思想方面，学界也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在《易学哲学史》中，朱伯崑先生说：“程颢的易说，以仁德和至诚的境界解释‘生生之谓易’，认为天地之道和阴阳变易的法则不离人心。”与此同时，朱伯崑先生还探究了程颐对《周易》性质和体例的认识，认为“程氏易学同周敦颐的学说有着批判地继承关系”。在《周易概论》一书中，刘大钧先生研究了程颐的易学思想。刘先生认为，“在程氏《易传》中，‘理’不但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高怀民先生认为，“大程子对于易学有非常精深之思，……他的学养却予人以浑然圆通自然、无棱无角的感受，似是直接涌身入于所向往的‘道’中，不着力地不刻意描模地把握了易学的根本义”。在谈及程颐易学时，高怀民先生说：“读小程子《易传》，给我们的深刻感受是他的深入

洪梅：《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齐鲁学刊》2015年第4期。

李韦：《“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的生态哲学面向》，《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98页。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见解多在道德修为方面，有其修为之功，乃有其深刻独到之文”。在余敦康先生看来，程颢和程颐认为“儒理就是天理，天理就是易理，这个思想就是他们以理言《易》的理论框架和哲学纲领”。

还有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研究了程颢和程颐的易学。潘富恩先生研究了《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新春先生从“仁与天理通而为一”的视角，研究了程颢的易学思想，认为“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朱汉民先生探讨了程颐易学与王弼易学的关系，认为“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黄忠天先生探讨了《二程集》易说及其与《周易程氏传》的关系，认为“《程传》固为伊川易学精华之所在，然其散见于《二程集》之易说，尚称繁富，倘能援以辅其《程传》，于伊川易学之掌握，当有更为全面、深入之了解”。赖贵三先生探讨了程颢易学与理学会通之道德形上思想，认为“大程子依据《易》学提供的范畴与命题，将天道与人道从本体论上熔铸在一起，建立起他自己体悟而得的道德形上思想体系”。谢晓东先生探讨了《周易程氏传》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应该“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转变”。张克宾先生研究了程颐易学的“卦才”说，认为“卦才说为程颐解经提供了沟通卦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北京：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392页。

潘富恩：《论程颐《周易程氏传》的辩证法思想》，《学习论坛》2006年第6期。

王新春：《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

朱汉民：《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齐鲁学刊》2010年第1期。

黄忠天：《二程集易说初探》，《周易研究》2006年第5期。

赖贵三：《“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程颢理学与理学会通之道德形上思想析论》，《国学学刊》2016年第1期。

谢晓东：《论伊川易传中的民本思想》，《周易研究》2008年第4期。

爻象与卦爻辞的桥梁，使其能够在注解经文时大加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唐纪宇先生从《易传序》入手，研究了程颐的易学思想。吴丹先生比较了二程易学本体论与王弼的异同，认为程颢和程颐“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韩慧英女士研究了《周易程氏传》的易道观，认为该书“不仅集中体现了程颐在易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同时也涵盖了他的整个理学精髓以及深刻的哲学思考，乃至强烈的人生追求”。

三、理学体系建构

就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而言，学界也已有不少研究。朱汉民、肖永明二位先生认为，二程“人性论的建构，也主要是通过对《四书》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而进行的”。姜广辉先生在《中国经学思想史》中，指出“二程通过对《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等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和利用，建构了一套贯通其‘天理论’、道德修养论与社会政治学说的精致理论”。孔令宏先生研究了二程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认为“二程的道体论明显继承了道家、道教的道论，其理的本

张克宾：《因象以明理：论程颐易学的“卦才”说》，《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1期。

唐纪宇：《从程氏易传序看程颐的易学观》，《周易研究》2015年第4期。

吴丹：《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韩慧英：《程氏易传的易道观》，《哲学动态》2010年第2期。

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4页。

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

体论是仿照道家、道教的道本体论而建立的”。曾春海先生探讨了二程理学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姜海军先生研究了二程对思孟学派的推崇与诠释，认为“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对思孟学派极力推尊，并以思孟学为基础建构新的儒学形态——理学”。彭耀光先生探讨了二程辟佛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认为“二程理学的核心范畴及重要命题，都是针对佛教的错误倾向、通过对儒学展开新的诠释提出和形成的，因而有其特殊内涵”。高建立先生探讨了二程哲学与佛学的关系，认为“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王书华先生认为，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集中表现在认为荆公新学不知‘道’，不合‘义’，学术不醇，心术不正，企图通过否定新学来否定王安石变法，并力图以自己创立的洛学来代替新学在北宋中后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具体到二程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方面，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朱伯崑先生认为，程颐的理学体系“是以其易学为基础形成和展开的”。朱伯崑先生在论述程颐易学时，认为程颐将“‘生生之谓易’解释为生物不息的仁爱意识，认为此意识即《中庸》说的‘至诚无息’

孔令宏：《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3页。

曾春海：《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姜海军：《二程对思孟学的推尊与诠释》，《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

彭耀光：《二程辟佛与理学建构》，《哲学动态》2012年第11期。

高建立：《二程哲学与佛学之关系》，《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

王书华：《二程对荆公新学的批判》，《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的德行，也是圣人的最高精神境界”。在《周易概论》一书中，刘大钧先生指出：“正如王弼把注《周易》当成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一样，程颐也以此作为发挥自己理学思想的工具。”刘大钧先生认为，程颐将天理纳入《周易程氏传》，使得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学著作。胡自逢先生在《程伊川易学述评》中，也谈到了程颐的易学研究与其理学心性论、工夫论的关联。胡自逢先生指出：“伊川论性命，自天理、天命而下逮于性，穷其本原也。复由心而性，而命，则又以为儒学之阶梯也，其间有可寻之次第，故下学上达之事，无不毕具。”高怀民先生认为，程颐的《定性书》“虽非论易之言，然其义全合于易，故引《易·咸卦》九四之文以证明之”。在谈及程颐易学时，高怀民先生说：“小程子在修养工夫中两个主要的操守——‘诚’与‘敬’，数其根源，也密切联系着易学。”在《汉宋易学解读》中，余敦康先生说：“二程主要是通过易学研究来体贴天理的。”余敦康先生认为，程颐是通过撰写《周易程氏传》，界定了天理的内涵，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理学体系的建构。向世陵先生在《理学与易学》一书中，在探讨宇宙的化生、保合太和说、形而上下说、继善成性说和生生之谓易等问题时，研究了二程的易学思想与其理学体系的关系。在谈及二程对形而上下的认识时，向先生说：“二程虽然是理本论的奠基人，却很少直接从‘理’的角度讨论‘上下’。”刘玉建先生研究了程颐的易学与其天理论的关系，指出“就理学而言，程颐的天理无疑是整个宋明理学的核心本体论。然而就其天理内涵而言，在本质上又是对《周易》本体思想的发明与挺立，其本体论的内在易学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97页。

胡自逢：《程伊川易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253页。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09页。

向世陵：《理学与易学》，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特征在整体理学中颇为鲜明与凸显”。杜保瑞先生探讨了程颐的理学体系建构与其易学的关系，认为“程颐就是完全继承并发挥自《易传》中已经呈现的儒门义理易学的传统，藉由卦爻辞解释，发挥儒家修养论观念”。

四、文献鉴别

《二程集》是本研究的核心典籍。在该书中，已经明确归属的文献，可以拿来即用。没有明确归属的文献，主要是《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简称《遗书》）和《河南程氏外书》（以下简称《外书》）。笔者认为，《遗书》和《外书》集中反映了二程建构其理学体系的过程。因此，鉴别《遗书》和《外书》，对还原二程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研究程颢易学，乃至进行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研究等，都是基础性工作。离开这一工作，本研究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遗书》鉴别方面，前辈学者也做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可贵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对《遗书》加以鉴别。例如，陈荣捷先生反对将《遗书》中标明为二先生语的语录强加区分，指出：“《遗书》卷一至卷十门人所录者称为‘二先生语’，朱子亦只用‘程子’，皆因二程思想方向虽不同，而根本则无大异也。”唐君毅先生也认为《遗书》的鉴别必要性不大，指出：“大率《遗书》中所记为二先生语者，盖皆明道伊川所共说，或记者视为二先生所共说者。”

也有些学者认为，鉴别《遗书》，有利于厘清二程的思想异同。在

刘玉建：“天理”的易学体贴——程颐天理的本体涵养，《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

杜保瑞：《论程颐形上学与功夫论及易学诠释进路的儒学建构》，《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65期。

陈荣捷：《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62页。

研究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时，冯友兰先生已经分别对《遗书》的鉴别做了诸多努力。例如，在解释程颢和程颐对理的不同理解时，冯先生对《遗书》卷一“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一句做了鉴别，认为“此第二条未注明为二先生中何人所说。但似可视为系明道所说，因其与第一条意相同”。牟宗三先生提出了鉴别《遗书》的四个标准：第一，“凡属二先生语者吾人可视为二程初期讲学之所发。此期当以明道为主”。第二，“明道心态具体活泼，富幽默，无呆气。故二先生语中凡语句轻松、透脱、有高致、无傍依、直抒胸臆、称理而谈，而又有冲虚浑含之意味者，大体皆明道语也”。第三，“明道语句简约，常是出语成经，洞悟深远。又常是顺经典原文加几个口语字，予以转换点拨，便顺适调畅，生意盎然，全语便成真实生命之呈现”。此条标准脱胎自《上蔡语录》，原文为“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第四，“明道喜作圆顿表示，伊川喜作分解表示”。对《遗书》鉴别来说，牟先生提出的四条标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二程哲学体系》一书中，庞万里先生不仅考察了二程哲学的异同，而且对《遗书》做了鉴别。庞先生还提出了四条鉴别标准，依次是：第一，直接找出判别的依据；第二，从二程各自不同的用词用语习惯，及所注意和研究的问题的不同来判别；第三，综合的考察；第四，理证的方法。

在本书中，在《遗书》鉴别上，对于没有明确归属的二程语录，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63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页。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7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3-414页。

笔者将参考朱熹、黄宗羲等前贤的鉴别意见和冯友兰、牟宗三等现代学人的成功做法，加以鉴别。对于归属有争议的语录，笔者将通过语言风格比较、思想脉络、问题关注点等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鉴别。至于《外书》，因其价值有限，笔者将主要采用已有明确归属的语录。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但是，在程颢易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程颐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续探讨的余地和必要。

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立足易学视野，探究程颢和程颐的易学研究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以期继续推进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的研究。